

《亨利六世》的海盗书写 与地图想象探究^{*}

郭方云 和 平

【摘 要】《亨利六世》的海盗演绎并非对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格兰动荡政治生态的简单模仿，而是蕴含深刻空间隐喻意义的精巧设计。本文将海盗叙事与文学地图并置，基于16世纪末英格兰的特定历史背景，探究该剧特殊的帝国共同体想象方式及其象征语义。《亨利六世》的海盗书写与地图想象不仅反映了英西海战后英格兰普遍存在的空间焦虑情绪，还展现了莎士比亚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海盗行为正当性及帝国共同体形塑神圣性的真实看法。

【关键词】《亨利六世》 海盗 地图 权力想象

【作者简介】郭方云，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文学地图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平（通讯作者），文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5）03-0092-19

一、引言

《亨利六世》三联剧创作于1590—1592年，与《理查三世》共同构成了被称为莎士比亚“第一四联剧”的早期历史四部曲。作为开启莎士比亚系列历史剧序幕的头三部剧，《亨利六世》将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年）末期英国跨海远征法国的历史场景搬上了剧场舞台，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地理学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23&ZD279）子课题“中西文学地理学比较研究”、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农事书写、农事地图与农事政治”（2025J0400）的阶段性成果。

再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王室家族围绕英格兰王位展开的、史称“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年）的权力纷争的场景，为英国剧场观众呈现了丧权失地、内乱频发、动荡不安的王国图景。针对上述图景，莎士比亚借用文艺复兴时期流兴的修辞学策略进行了情景转喻：在《亨利六世》（中篇）第4幕第9场中，在得知约克公爵已在爱尔兰起兵谋反的紧急军情后，亨利王（亨利六世）悲叹其险境中的王国好像一叶孤舟，刚幸免于“凯德”这股海上风暴，随即就又遭受“海盗”的袭击。^①

其中的关键词“海盗”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美国学者丹尼尔·C. 杰罗尔德（Daniel C. Gerould）认为，亨利六世有关海盗的言行不仅凸显了王国面临的困境，还暗示海上掠夺已成为英格兰的王法实践。^②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安德鲁·哈德菲尔德（Andrew Hadfield）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亨利王的海盗修辞与其“我们必须学会更好地处理国政”这一旨在“预防未来叛乱”的治国洞见密切关联，“准确表达出了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叛逆和反叛（频发）的复杂政治”。^③ 英国学者克莱尔·乔伊特（Claire Jowitt）发现，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篇）的海盗演绎表明人物和罪行之间存在能引发联想的隐喻性，以此表达政治稳定性构建的模糊性与困难。^④ 法国学者帕斯卡莱·德鲁埃（Pascale Drouet）则聚焦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人仇视法国的情绪，指出该剧中的海盗比喻暗指英格兰海岸已为约克公爵的反叛敞开了门户。^⑤ 上述学者主要聚焦彼时英格兰面临的内忧外患，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对亨利王的海盗修辞进行了剖析。美国现代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亨利王的海盗之喻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手法日益精进的明证，与《理查三世》中理查的“好比一叶扁舟，岂敢驶进大海”的“身体—王船”类比一道，呼应了莎式历史剧从明喻向隐喻过渡的修辞转向。^⑥ 以上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未对《亨

① 参见[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页。

② 参见Daniel C. Gerould, Principles of Dramatic Structure in “Henry VI”,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Vol. 20 (3), 1968, pp. 376–388.

③ 参见Andrew Hadfield, Treason and Rebellion, in Donna B. Hamilton,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 197.

④ 参见Claire Jowitt, *The Culture of Piracy, 1580–1630: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eaborne Crim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26.

⑤ 参见Pascale Drouet, Popular Riot in Shakespeare’s 2 *Henry VI*, in David Bell and Gerald Porter, eds., *Riots in Literatur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 11.

⑥ 参见John Berryman, Pathos and Dream, in John Haffenden, ed., *Berryman’s Shakespeare*, ed. John Haffen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 52;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利六世》中英格兰航海叙事及海盗书写进行深入探究,更未论及特定历史背景下英格兰共同体的地图演绎方式及其象征意义。这便构成了本文的选题缘起。

二、王舟受困“海盗”的历史文化源流、地图表征及时政映射

如前文所述,当得知约克公爵已经在爱尔兰起兵谋反的紧急军情后,亨利六世借用了以“海盗”为核心语码的修辞手法进行情境转移:“这真是左狼右虎,我的国家竟遭受到凯德和约克的两面夹攻。好比一只航船,刚刚逃过一阵风浪,又受到海盗袭击。如今凯德刚被击溃,随即就有约克起兵追随他的后尘。”^①

在上述王舟受困“海盗”的空间困境表达背后,有极具现实意义的历史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式的民族记忆源流。纵观英国历史,海盗不仅是助力不列颠空间疆域建构的关键力量,而且是英国国家身份塑造的催化剂。878年,丹麦国王古特鲁姆南下入侵英格兰,迫使阿尔弗雷德大帝与其共同统治英格兰。9—10世纪,维京海盗南下掠夺,洗劫了不列颠群岛及法国沿海地区。^②自1016年至1035年,丹麦大军在国王克努特的率领下再次南下入侵英格兰。上述异族入侵史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被视为英格兰王国险境的海盗转喻之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的本意就是“盎格鲁人的土地”,乃自287年起盎格鲁-萨克逊海盗武力征服不列颠群岛东南地理空间的产物。^③由此可见,海盗在英国国家身份塑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源自古希腊的海盗形象及其掠夺行为,在荷马史诗中已得到想象性与文学化的书写表征。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锡德尼的《阿卡狄亚》等文学作品中得以延续,并进一步被演绎为事关王国乃至帝国空间生产与征服的媒介性语码或惯用表征符号。这些元素很快融入早期现代英格兰共同体想象及形塑的空间话语场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共时语境而言,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格兰剧场中,海盗题材是引人入胜的展演主题。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哈姆雷特》等剧中就有直接参与舞台表演的海盗人物,或是那些带有鲜明海盗特征的角色形象。《托马斯·斯图克利船长生平志》《改宗土耳其的基督徒》等同时期英国戏剧中的海盗角色更是全剧的中心人物。《亨利六世》中的海盗展演就是此种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页。

② 参见 Clinton Vane Black, *Pirates of the West In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③ 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戏剧时代风尚的生动体现。不仅如此,“英国的海盗经历通常(也)被美化为未来(英)帝国的预见性漫游”,海盗乃帝国的先锋。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海盗行为被视作“英国对西班牙帝国扩张迟来的回应”。英国海盗有时还会“化身为政府代理人”。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到詹姆士一世时期,角色各异的海盗“描绘了英格兰对帝国扩张态度的变化”,其掠夺行为指出了“用一个特定群体或一套社会习俗来定义英国性的问题”。^①由此可见,海盗是现代英格兰帝国早期扩张及其共同体想象的媒介性语码。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锡德尼等英国文化精英对该词的运用折射了民族国家意识萌芽时期的英格兰共同体意识及其想象图景。亨利王的海盗修辞无疑是“帝国扩张”与共同体形塑焦虑的戏剧映射。

就亨利王的“王国如船”这一英格兰疆域空间表征的地图语境而言,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出现了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和赫拉德·墨卡托(Gerard Mercator)等诸多影响深远的地图学家,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Christopher Saxton)、约翰·诺登(John Norden)、爱德华·莱特(Edward Wrights)、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等英格兰制图师也相继涌现。地图以无可匹敌的空间优势占据了欧洲知识话语的核心地位,其价值不仅源自其无可代替的导航功能,还在于其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考证显示,在伊丽莎白一世晚期,地图的影响力已覆盖英国社会的各类群体,如政府在规划和实施国内外重大决策时大量使用地图,贵族运用地图管理他们的领地,航海家则依靠地球仪实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②美国当代地理学家约翰·伦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感叹道:“16世纪的空间实践成就了一场卓越的革命,它改变了我们表征世界的方式:宇宙局限于球形区域之内;世界被(经纬度)网化切分;海洋被探索;陆地被测量。空间实践被符号化,创造出新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地图认知技能。”^③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学地图的生成已是大势所趋,《亨利六世》中受海盗困扰的“英格兰之舟”想象就是文艺复兴地图化潮流的具体表现。

从海盗、航海与制图的关系看,三者西方疆域空间的生产方面已融合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海盗的航海掠夺,还是中世纪维京海盗对英吉利海域的洗劫,抑或大航海时代英格兰海盗在加勒比海等

① 参见 Barbara Fuchs, *Mimesis and Empire: The New World, Islam and European Ident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8 - 119。

② 参见 Adam Max Cohen, *Shakespeare and Technology: Dramatizing Early Modern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6, p. 45。

③ John Rennie Short, *Making Space: Revisioning the World, 1475 - 1600*,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

海域打劫西班牙运宝船的行为，其本质皆是为攫取权力、空间及财富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行为，说明“早期现代的海盗行为往往与‘私掠’（privateering）交织在一起，作为削弱敌国和对手的工具被君主和其他有权势之人允许甚至鼓励”。^① 16世纪末，西班牙人眼中的私掠行为“介于海盗掠夺（piracy）和战争之间，是动员海事界（maritime community）为王国政府服务的有效方式”。^② 由此来看，亨利王的王舟受困于海盗的情境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彼时英格兰面临的海外空间生产困境以及潜在的海盗威胁。

事实上，亨利王的“英格兰王舟”受海盗围困情景体现的海盗忧惧，并非莎士比亚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结果，这一书写方式是有现实依据及原型的。16世纪90年代，北非海盗成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不列颠人的一大梦魇。有记录显示，该时期的英格兰人曾受到北非海盗袭击，英格兰船只失事和船员被贩卖为奴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据估算，仅在16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就有1000多名不列颠人成为北非海盗的受害者。^③ 这些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于，“从16世纪末开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英格兰人以奴隶、奴隶贩子或买回者（redeemer）的身份陷入地中海商贸和奴隶贸易体系之中，这甚至威胁着其中一些不列颠人关乎自身差异性 & 民族身份的认同”。^④ 有时连王室成员也不能幸免——1406年，年仅11岁的苏格兰王储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在英吉利海峡被英格兰海盗俘获，后被献给亨利四世，关进了伦敦塔，小王储潜在的苏格兰国王身份及隐喻的权力空间就此被海盗解构。^⑤ 由此观之，无论是亨利王的“王国如船”的海盗譬喻，还是萨福克的“今天我萨福克也在海盗的手里丧生”^⑥ 的临死哀鸣，都是一种戏剧镜像，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人乃至不列颠人的海盗忧惧，实乃16—17世纪英国

① Nate Probasco, Estelle Paranque and Claire Jowitt, Introduction to Colonization, Piracy, and 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Roles of Powerful Women and Queens, in Estelle Paranque, Nate Probasco and Claire Jowitt, eds., *Colonization, Piracy, and 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Roles of Powerful Women and Queen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5.

② David M. Loades, *The Making of the Elizabethan Navy 1540 – 1590: From the Solent to the Armada*,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2009, p. 137.

③ 参见 Catherine M. Styer, *Barbary Pirates, British Slaves, and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570 – 1800*, Ann Arbor: ProQuest LLC., 2011, pp. 32 – 33.

④ Catherine M. Styer, *Barbary Pirates, British Slaves, and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570 – 1800*, Ann Arbor: ProQuest LLC., 2011, p. 23.

⑤ 参见 Charles Phillips, *Th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he Kings & Queens of Britains: A Magnificent and Authoritative History of the Royalty of Britain, the Rulers, Their Consorts and Families, and the Pretenders to the Throne*, London: Hermes House, 2006, p. 69.

⑥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7页。

“囹圄叙事” (captivity narrative) 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的戏剧变体。^①

需要指出的是，亨利六世的“王国之舟”被海盗袭击的剧场想象不仅是国内动荡局势的映射，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在海外版图扩张方面的空间生产焦虑。正如伊丽莎白一世研究专家苏珊·罗纳德 (Susan Ronald) 指出的那样，如果仅凭彼时英格兰同西班牙、法国之间的冲突就断言伊丽莎白是一个“帝国扩张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她看来，英格兰的历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约翰·迪伊 (John Dee)、克里斯托弗·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和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巨匠“在思想、科学和文学上来树立”。换言之，彼时的英格兰帝国扩张依托的是虚妄的想象，而现实层面的“王国之舟”同样脆弱，无法摆脱“海盗”这一空间生产困境转喻体的羁绊。例如，伊丽莎白女王的新教统治事业就不得不“通过当时无数的商人和绅士探险家的贸易、掠夺和殖民扩张来确保”。^② 在英格兰诗人杰弗里·惠特尼 (Geoffrey Whitney) 的想象下，甚至连被标榜为英格兰海盗的弗朗西斯·德雷克 (Sir Francis Drake) 本人，在对外扩张及新地理发现的航海途中，也面临来自海盗等凶残敌人的威胁。^③ “海盗”在语用学层面的帝国空间生产困境转喻可见一斑。

从另一维度看，莎士比亚借助《亨利六世》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及其掠夺行为正当性的看法。考证发现，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即便是最小的商船，在出海时也会携带武器，当其在海上遭遇海盗时，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暴力界限往往变得模糊不清——“私掠者、海盗和其他以英国殖民地为基础的暴力分子凶残地抓住了法律模糊性提供的契机，在掠夺国外帝国的同时也参与了野心勃勃的私人战争和偷窃行为”。^④ 例如，受伊丽莎白一世支持的英格兰航海家托马斯·斯塔克利 (Thomas Stukeley) 就“在报复性拘捕证的合法掩盖下从事着非法的贸易”，^⑤ 德雷克则因其“新教改革的捍卫

① 参见 Neil MacGregor, *Shakespeare's Restless World: A Portrait of an Era*, New York and London: Penguin, 2013, p. 186。

② 参见 [美] 苏珊·罗纳德：《海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英帝国的崛起》，张万伟、张文亭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 页。

③ 参见 Peter C.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An Elizabethan's Obsession for an English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66。西班牙人对德雷克的海盗身份界定详见 David Childs, *Pirate Nation: Elizabeth I and Her Royal Sea Rovers*, Barnsley: Seaforth Publishing, 2014, p. 24。

④ Matthew Norton, *The Punishment of Pirates: Interpre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rder in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Empi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 2.

⑤ [美] 苏珊·罗纳德：《海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英帝国的崛起》，张万伟、张文亭译，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 页。

者”的身份“成为所谓合法性与暴力之间联系的化身”，被伊丽莎白一世委以整顿普利茅斯海盗的重任，从而淡化了其自身亦为海盗的事实。^① 面对培根对英格兰海盗的指控，雷利爵士更是辩称：“你曾听说过抢过百万的海盗吗？只有那些小打小闹的抢掠者才是海盗。”^② 在一定程度上，《亨利六世》聚焦英格兰“王国之舟”被瓦解、瓜分的海盗式掠夺及其背后的权力建构机制，也再现了《亨利六世》中的王权篡夺图景：无论是亨利王与海盗同舟的想象，^③ 还是玛格丽特王后描述的在其掌舵下的英格兰航船与“海盗”约克公爵等在想象的洋面上遭遇之后的海战图景，^④ 都以剧场化方式投射出伊丽莎白一世及德雷克等依靠海盗掠夺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历程，这就从国家层面为16世纪末期英格兰海盗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海上运宝船的打劫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亨利六世》三部曲不仅仅是停留在大航海语境下伊丽莎白时期的帝国空间焦虑上。据史料记载，1591年《亨利六世》的公演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现场反响热烈。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甚至暗讽他是“突然发迹的乌鸦”，“借（他）们的羽毛装点自己”，“包藏虎狼之心”。^⑤ 由此可见，《亨利六世》在英格兰帝国空间生产出现困境之际激发了共同体呼吁——借王后玛格莱特之口，莎士比亚表露出他对英格兰主导的不列颠群岛政治生态的忧虑：

英国朝廷的风尚是这样的吗？不列颠岛国的政治，阿尔宾王上的王权是这样的吗？难道说，亨利王上老要在乖戾的葛罗斯特管辖之下当小学生吗？难道说，我只能挂着王后的虚衔，在公爵面前俯首称臣吗？^⑥

① 参见 Andrew Read, *Pirates and Privateer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in Samuel White, ed., *The Laws of Yesterday's Wars: From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o the American Civil War*, Leiden Boston: Brill-Nijhoff, 2021, p. 182.

② Nigel Cawthorne, *Pirate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Jersey: Chartwell Books, Inc., 2006, p. 27.

③ 《亨利六世》中亨利王“受海盗袭击”的修辞的英语原文为“Like to a ship that, having scaped a tempest, Is straightway calmed and boarded with a pirate”，其中“boarded with a pirate”形象地传递出亨利王与海盗“同舟共济”的航海图景。参见 William Shakespeare, “2 Henry VI”, in John Jowett, William Montgomery and Gary Taylor et al., eds., *The Oxford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4.

④ 参见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4~785页。

⑤ Geoffrey Bullough, ed.,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Volume III: Earlier English History Play: Henry vi Richard iii Richard i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23-25.

⑥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4页。

在此处，莎士比亚突破时空的局限，将亨利六世及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伦与古不列颠紧密联结，形成一个事关不列颠共同体建构的时空体。通过女性化的亨利六世与勇猛的“阿尔宾”王之间鲜明的身份对比，莎士比亚将戏剧主题引向他的认知中理想君王的建构及不列颠的空间身份塑造上。在英西海战后的三年间，西班牙及其天主教联盟试图卷土重来，再次入侵英格兰，而英格兰自身也面临海外殖民受抵抗等空间生产困境。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唯罗马教廷马首是瞻的亨利王既无法迎合伊丽莎白一世新教阵营的反天主教理念，也无法满足剧场观众的帝国期待视野，公众的视线因此由国内转向国外。在此背景下，《亨利六世》借助对地理大发现及大航海时代的语境重置，将英格兰置于浩瀚无垠的航海语境之下，如同“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的《圣经》叙事，莎士比亚也赋予亨利六世“依靠上帝的庇佑和支持”的言语行为，为观众呈现“挪亚方舟上的英格兰”这一帝国航海图景，进而在事关王船隐喻的空间生产困境书写中，将戏剧的展演动机引向呼应伊丽莎白一世时政的帝国共同体形塑。总之，在1588年英西海战后持续高涨的英格兰民族及国家意识主导下，《亨利六世》以“王国如船”的地图想象为英格兰帝国空间攫取欲望提供了剧场形塑与展演。

三、地图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

如前文所述，玛格丽特对古不列颠先王们的追溯，将《亨利六世》的舞台展演引向了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的憧憬。这并非莎士比亚信手拈来的戏剧桥段，而是剧作家本人乃至剧场观众共有的英格兰帝国野心的展现。纵观英国历史，对不列颠跻身欧洲宗教及政治权力中心地带的地理想象，始终是不列颠人帝国形塑的重要策略。特别是在英西海战后，将包括美洲殖民地及低地国家在内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塑造成形，是伊丽莎白一世乃至英格兰文士阶层虚妄的帝国之梦。构建由英格兰主导的不列颠共同体^①的想法在此前就已出现，16世纪30年代，英格兰议会宣称“英格兰（王国）即‘帝国’”，由此开启了现代英格兰国家身份建构的历史进程。^②皇家导师迪伊辩称，“‘伊丽莎白一世有权拥有广袤的域外属地’，因为这些领

① 以英格兰指代不列颠群岛是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人建构帝国共同体进而表露帝国野心的常见做法。以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为例，刚特著名的“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中英格兰群岛形塑就是此种共同体的典范。参见〔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② 参见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4.

地曾属于其先祖亚瑟王”，他认为伊丽莎白恢复古老大英帝国的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其神圣职责所在。一旦合法的海外领土被“回收利用”，许多秘密和奇迹将被上帝之力揭示。^① 16世纪70年代，博学多智的女王秘书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对英格兰的帝国性构建也有所关注——尼古拉斯·坎尼（Nicholas Canny）对此概述道：“将英格兰‘联邦’扩展到其历史边界之外的唯一方法是军事征服，然后沿着罗马人喜欢的路线建立殖民地。”^②

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建构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大洋上的英伦群岛在历史上曾被古罗马、维京海盗和法国侵略或征服过。这些事件导致的后果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制图史上，不列颠连同爱尔兰和周围的岛屿一道，长期被置于地图空间的边角地带，被想象成“他者化”的、远离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边缘世界。^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想象性形塑无疑有助其重构地理身份。同时，早期现代欧洲“事物秩序”的剧变使英国发现了重构世界地理的契机。特别是在政治秩序上，“神圣罗马帝国或普世教会等支配性权力结构在主权政治斗争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已经瓦解，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在“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可以凭借自身力量重塑为一个‘宇宙’”的认知影响下，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王国也通过对伊丽莎白一世的身体政治及人体宇宙论的演绎，努力建构其帝国身份。^④ 1588年，约翰·凯斯（John Case）的政论评著《国家政体》卷首图就将伊丽莎白一世地图化：英格兰女王高居上帝所在的页面顶端，整个地球仪则被笼罩在她巨大的罩袍之中，彰显了她意图征服世界的空间野心。10个圆环将地球仪嵌套成10个区域，最外环刻有“英吉利、爱尔兰和法兰西之保护神”字样，紧挨着的一环则刻有“政治英雄的仙居”，然后由表及里分别被庄严、审慎、坚韧、信仰、宽容、仁慈和富庶七美德占据，中心由“无可撼动的正义”统领。^⑤ 其意义在于，通过援引文艺复

① 参见 John Cooper, *The Queen's Agent: Sir Francis Walsingham and the Rise of Espionag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3, pp. 234 – 235。

② Nicholas Canny, *The Origins of Empire: An 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 The Origins of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

③ 参见 Aisling Byrne, *Otherworlds: Fantasy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3 – 145。

④ 参见 Suzanne Scholtz, *Body Narratives: Writing the Nation and Fashion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asingstoke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 4 – 5。

⑤ 参见 Charles B. Schmitt, *John Case and Aristotelianism in Renaissance Engla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7; Annabel S. Brett, *Changes of State: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 the City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Law*,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 – 2。

兴时期流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及地图学模型，构建出伊丽莎白一世比肩圣子耶稣的寰宇统治图景，从而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格兰帝国想象提供支撑。

自英西海战时代以降，英格兰帝国想象日益浓烈。从表征形式的艺术化潮流看，在《亨利六世》中凯德关于英格兰政身被阉割的表述实乃莎士比亚对当时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焦虑的地图戏仿：“丢了缅因，英国就残缺不全，若不是仗着我大力支持，她就得拄着拐杖走路了。……赛伊勋爵把我们的国家阉割了，把它弄成一个太监了。”^①在此情境下，被阉割后的女性化、畸形、残缺的英格兰人体想象，^②连同“驼背理查”“把灿烂的王冠戴到我这丑陋的躯体上端的头颅上”^③的英格兰君王形象表达，共同勾勒出《亨利六世》基于男性残身的畸形英格兰空间图示。通过剧场化的英格兰地图呈现，莎士比亚将安佐和缅因的丧失类比为对亨利六世自然身体的破坏行为，其寓意可谓深远。当然，这种特殊的身体展演不仅是涉及文学绘图的象征行为，而且与约克公爵指控的被“海盗”败光^④的戏剧演绎形成了语义关联。在《亨利六世》（中篇）中，凯德党羽乔治·培维斯告诉约翰·霍兰德：“成衣匠杰克·凯德打算把咱们的国家打扮起来，把它彻底翻新，面子上装上一层新的毛茸茸的呢绒。”后者附和道：“他真该这样做一下，因为咱们的国家的服装已经破旧得很了……”^⑤通过政体衣衫的隐喻修辞，莎士比亚不仅回应了前文提及的伊丽莎白女王政体罩袍话题，而且点出了海盗威胁引发的政身破损危害。地图是政体的图示化表达，破败的政身对应的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地图。至此，莎士比亚借用寓意深刻的政体地图隐喻，非常含蓄地对国王女性化的政治史以及将女王妖魔化的英格兰当朝皇室进行了批判。

在上述地图戏仿中体现的地图想象有其语境基础。“地图想象”可分为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653页。

② 从历史语境看，凯德的被阉割的男性英格兰图示想象在本质上影射了亨利六世当政期间权力被玛格丽特一手操控的局面：一方面，玛格丽特掌控大权；另一方面，她还得通过亨利六世这个傀儡来实施权力，由此造就了类似雌雄同体的英格兰权力秩序。莎翁赋予凯德的畸形英格兰图示便是此种畸形政治形态的镜像表达。

③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5页。

④ 参见[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7~588页。

⑤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7页。

两个层次：其一，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作家对同时期欧洲制图师所绘地图的文学映射或再现；其二，剧场观众对文学地图的想象性成像。英格兰制图师萨克斯顿的《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地图》、荷兰匿名制图师雕刻的《化身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一世》等地图相继出现，为《皆大欢喜》中的世界大舞台类别修辞、《李尔王》中的三分天下地图演绎及《错误的喜剧》中的女性身体地图隐喻等莎士比亚戏剧的地理想象提供了视觉化素材。^①然而，受制于制图技术和成本等因素，地图的流通规模依然有限，大多数剧场观众需要发挥地图想象力，去填补莎士比亚剧地图实际内容的空白。由此可见，“地图想象”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对世界地理的图绘形式，还是彼时观剧者感知世界地理的重要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在《亨利六世》中，修复英格兰这一被阉割的王国身体，进而重绘其地图空间的重任，既无法由凯德这一社会底层人物承担，也无法由作为王国领地丧失诱因的玛格丽特王后肩负。^②最终，重建想象中的“阿尔宾”的责任由约克公爵承担。他雄心勃勃地说道：“在我看来，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这些国土都是我心头之肉，都是我生命的寄托。而他们竟然把安佐和缅因送给了法国人！……那法兰西，如同英格兰的肥沃土地一样，原是我想要弄到手的。总有一天我约克要把自己的东西收归己有。”^③

约克关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空间想象的言语独白，不仅重述了凯斯的《国家政体》卷首图中的英、法、爱三王国空间神话，还试图手持皇杖，“把法兰西的百合花放在杖头玩弄”，^④由此完成了隐性的帝王肖像画绘制，试图将他臆想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地图空间投射到剧场观众的脑海中。约克公爵的独白与《李尔王》中李尔的“把那地图给我”^⑤的主权声明是同质的，都揭示了在地图中潜藏的权力话语议题。在借助言语地图进行权威及

① 参见郭方云：《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5~17页。

② 借葛罗斯特之口，莎翁委婉道出了他对女王主政的态度：“你就得安分守己做女人，不让你这雌鸡学雄鸡叫。”见[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4页。莎翁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1591年诺里斯和德雷克在远征葡萄牙时关于“女王是个女人，而战争是男人的事情”的性别偏见。参见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3页。

③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

④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1页。

⑤ [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空间建构的特殊时刻，约克宛如“光辉远胜过裘力斯·凯撒”、^①“威力征服了整个法国”^②的亨利五世，不仅与“迪奇利女王肖像”上脚踩英格兰地图的伊丽莎白一世相互呼应，^③形成了鲜明的戏剧观照，而且再现了在16世纪迪伊英格兰帝国空间生产层面上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体地图想象。迪伊向伊丽莎白展示地图的相关记录表明，“他曾通过将不同的（世界）地理区域与伊丽莎白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关联，将女王的形象融入世界地图中去”，以此“象征伊丽莎白女王对亚洲和美洲领土的主权”。这种聚焦身体—地理空间置换的女王人体地图想象在1761年得到了视觉化的再现——比森特·德·梅米耶（Vicente de Memije）也将一位（隐喻西班牙的）纯真女王（*virgin queen*）叠加在西班牙帝国之上。^④

约克之所以借助舞台上的言语地图进行空间形塑，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研究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剧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地图”，因为该时期的剧本“或显或隐地包含了舞台和表演的指南”，其间“显示了一个跟踪场景变化的图示”。^⑤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曾断言，舞台和地图之间存在同质性——“几何投影也是舞台表演所必需的一种诗意投影”。在《地形学窥镜》一书的扉页，测量师阿瑟·霍普顿（Arthur Hopton）绘制出一幅非凡的图像，将德克的上述类比转化为“精确的制图等价物”。据此，“整个世界都可以按照一种‘艺术’的规则（被）还原成图形”，而“戏剧表演的想象力就像地图依赖的几何投影系统”一样至关重要。^⑥

当然，《亨利六世》中的这种言语地图建构也是对彼时英格兰君王语言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

②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③ 参见 Lisa Hopkins, *Writing Renaissance Queens: Texts by and about Elizabeth I and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2002, pp. 21–23。

④ 参见 Robert C. D. Baldwin, *Colonial Cartography under th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Monarchies*, ca. 1480 – ca. 1640, in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ume 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760; Ricardo Padrón, *The Spacious Word: Cartography Literature and Empire in Early Modern Spai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233。

⑤ 参见 Mart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Aspects of Theatre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7。

⑥ 参见 Henry S. Turner,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Stage: Geometry, Poetics, and the Practical Spatial Arts 1580–16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7。

制图的戏剧化映射。伊丽莎白一世以“英格兰、爱尔兰暨法兰西国王”自居。^①作为君王野心的具体体现,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于1590年绘制出附有王室家谱表和伊丽莎白画像的英格兰暨爱尔兰地图。^②弗朗西斯·乔布森(Francis Jobson)进一步完成了英格兰的爱尔兰殖民地阿尔斯特地图。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英格兰人初到弗吉尼亚图》则将弗吉尼亚纳入英格兰版图。在对法兰西的主权诉求上,为了应对西班牙军队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军事部署,伊丽莎白一世于1591年派遣远征军登陆法国,进行武装干涉。^③1592年,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出版了《法国的地形描述》一书,以文本空间的形式刻画“法国的地区、省份、城市、自然资源、居民及他们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法律和习俗”。^④以上事实表明,英西海战之后的英格兰有重建强大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强烈空间诉求。毫无疑问,这也是《亨利六世》最初公演时观众反响强烈的根本原因,它唤起了英格兰人早已萌生、却一度被西班牙压制的帝国意识。在提出重塑“阿尔宾”这一古不列颠共同体图示,以此满足时政需要、振奋同胞士气的同时,莎士比亚也借机表达了他对伊丽莎白一世进军法兰西的期望,以此拓展了《亨利六世》历史展演的象征维度及共时向度。

此外,莎士比亚还借约克公爵之口表达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格兰文士阶层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认知与共谋。为了塑造想象中的帝国地理空间,英格兰的“专家和理论家们进行了时间(或历史)考察。作为宇宙志学者、历史学家及编纂师,他们恢复和篡改了相关记录、神话和地图,主张建立一个通过控制不列颠群岛周边海域及遍布世界的海洋来确保自身安全的全球帝国”。^⑤迪伊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认识到“地理改革与新教一样,更多只是一种解释,而非绝对真理,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必须被绘制、论证和构建。在评估这些地图时,我们不应该期望它们符合地理和历史逼真度的现代标准”。^⑥这

① 参见 Jeffrey L. Forgeng, *Daily Lif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Oxford: The Greenwood Press, p. 70。

② 参见 Paige Newmark, “She is Spherical, like a Globe”: Mapping the Theatre, Mapping the Body, *Shakespeare in Southern Africa*, Vol. 16 (1), 2004, p. 17。

③ 参见 [英] J. E. 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聂文杞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50~351页。

④ Monica Matei-Chesnoiu, *Re-imagining Western European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45-46。

⑤ William H. Sherman, Putting the British Seas on the Map: John Dee’s Imperial Cartography, *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 Vol. 35 (3-4), 1998, pp. 1-2。

⑥ William H. Sherman, Putting the British Seas on the Map: John Dee’s Imperial Cartography, *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 Vol. 35 (3-4), 1998, p. 3。

些关于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的探索模式及地理认知,无疑为莎士比亚在文学地图想象中进行国家想象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需要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塑造只不过是英国文学对英格兰帝国共同体进行形塑的冰山一角。早在1586年,威廉·沃纳(William Warner)就发表了诗体编年史《阿尔宾之英国》。该书不仅刻画了从挪亚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历史,还开启了集历史展演与诗学想象于一体的共同体艺术范式。具有政治效应与媒介功能的地图随之进入文本深处,演绎为诗学化的文学地图表达。1590年,与伊丽莎白一世御用制图师萨克斯顿有类似“意识形态契机”及“制图初衷”的“自省民族主义诗人”斯宾塞出版了《仙后》的前三卷,并以独创的“诗学景观”重绘英格兰文化地理。二者在“意识形态场域”相遇,构建起“诗学地图”的特殊空间范式,在对远古与神话记忆的回溯中重塑空间和历史,^①由此实现了物理制图与诗学制图在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上的融合。

以此观之,无论是凯德对亨利六世畸形政身的地图想象,还是约克对法兰西的语言地图建构,都体现了早期现代英格兰“诗学地图”的塑造策略,都指向伊丽莎白时代马基雅维利式的帝国共同体建构这一主题。为了维护英格兰的国土安全、体现自身政绩,约克公爵常常穿梭于爱尔兰海域与英吉利海域,^②英格兰当朝女王也采取了类似的空间策略。作为每年一度的王国常规活动,伊丽莎白一世定期出巡,先后到过多佛尔、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伍斯特、斯塔福德、诺里奇等地,象征性地完成了王国疆域的主权声明及空间量化。^③此外,英格兰制图师萨克斯顿于1579年完成了首部《英格兰暨威尔士郡县地图》,1590年,英格兰制图师诺登开始撰写图文并茂的袖珍版《大英百科全书》,两人共同完成了英格兰诸郡的景观绘制任务,^④为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为了重塑“阿尔宾”,实现不列颠帝国空间生产的野心,莎士比亚不

① 参见 Donald Kimball Smith, *Mapping More than the World: Shaping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2001, pp. 75-81。

② 从《亨利六世》的空间场域看,约克有时身处英格兰政治中心伦敦,有时在法国及爱尔兰等空间场域内进行地标切换,其间他需要横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等天然障碍,代表了一种帝国空间的建构行为。

③ 参见[英]J. E. 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聂文杞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7页。

④ 参见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Roger J. P. Kain, *English Maps: A History*, 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72, 104。

仅借红衣主教之口，用“半开化”、“土酋”（kerns）、“造反”^①等字眼界定、丑化爱尔兰人民的起义，^②而且刻意抹杀了彼时苏格兰王国具有的独立性。为劝说萨穆塞特和约克放弃决斗，共同对付“反复无常、变化多端”^③的法兰西人，亨利六世使用了颇具英格兰中心主义的修辞术：“你们两家都是皇族，我和你们都是骨肉至亲。犹如我这里戴上王冠，不能因为苏格兰王也戴王冠，就说我做的不对。”^④在剧中，莎士比亚不但隐秘地将“苏格兰”纳入“不列颠共同体”，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地图展演行为对现有王权空间的消解作用，极力模糊区域地图隐喻的疆域边界，打破空间隔阂。在亨利六世从苏格兰逃回及被捕的戏剧情节中，莎士比亚仅用“英国北部某处围场”^⑤来描述两个王国之间的地缘疆界，极力模糊原本应有的地图标识。威严的边防驻军^⑥则被不具名的护林人甲和乙^⑦取代。从英国制图史来看，莎士比亚此举不仅抹去了“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期，苏格兰的教会和政府为将其权力扩展到苏格兰边区和高地（the Borders and the Highlands）而进行（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尝试”，^⑧而且极大地弱化了苏格兰制图师蒂莫西·庞特（Timothy Pont）始于 1583 年的地产测量事宜及对应的地图草稿绘制工作的价值。^⑨这也为《亨利六世》面世 20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3 页。

② 参见 Robert Kee, *Ireland: A History*,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2, p. 32。

③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31 页。

④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31 ~ 532 页。

⑤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35 页。

⑥ 继 1455 年使王国趋于稳定的阿金霍尔姆战役（Battle of Arkinholm）后，1457 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开始聚焦英苏长期存在的边界问题，修建了许多军事据点，以此与英格兰边塞驻军形成对峙。参见 Charles Phillips, *The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the Kings & Queens of Britain: A Magnificent and Authoritative History of the Royalty of Britain, the Rulers, Their Consorts and Families, and the Pretenders to the Throne*, London: Hermes House, 2009, p. 71。

⑦ 参见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35 页。

⑧ Jeffrey Stone, Timothy Pont: Three Centuries of Research, Speculation and Plagiarism, in Ian C. Cunningham, ed., *The Nation Surveyed: Essays on Late Sixteenth-Century Scotland as Depicted by Timothy Pont*, Edinburgh: Tuckwell Press, 2001, p. 26。

⑨ 据推测，苏格兰制图师蒂莫西·庞特大致在 1583 年开启了苏格兰的地产测量事宜及对应的地图草稿绘制。参见 Charles W. J. Withers,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cotland Since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3 - 55。

年之后英格兰制图师斯皮德绘制《大英帝国概观》这一英格兰主导的帝国共同体地图提供了剧场化的前景预演：其中，相较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图上的河流、森林、市镇等指称标注，线条分明的郡边界划分，以及有关城市、主教辖区、城堡、集镇、街道、教堂等方面的统计数表体现出的精确性及地图功用性，^① 苏格兰地图没有基于郡划分的制图标尺，被简略地描述为“鱼虾、飞禽、牲畜及谷物丰饶”的“美丽空旷”之境。斯皮德的这种“蒸馏”苏格兰地理空间细节信息^②的制图法与莎士比亚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简化、荒野化的戏剧呈现是异曲同工的。不仅如此，莎士比亚还借用流亡法国的玛格丽特对苏格兰做出的“苏格兰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但它实力不足”^③ 的国力评价篡改了历史。在“正史”中，玛格丽特王后为获得苏格兰军事支持而卑躬屈膝，将英格兰的贝里克郡割让给苏格兰，使英格兰王国地图如凯德类比般残缺不全。^④ 莎士比亚的这种手法剧场化地再现了英格兰史学家约翰·哈丁（John Hardyng）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虚构的不同位格及地理藩属关系。为了凸显英格兰的主体地位，迎合当权的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哈丁曾伪造文献，借此臆造苏格兰向英格兰称臣的帝国臆像。^⑤ 如果再将哈丁的上述做法与伊丽莎白一世对苏格兰玛丽女王实施的长达 19 年的监禁行为联系起来，就更加证明莎士比亚的“阿尔宾”这一“不列颠共同体”愿景是对女王野心的有意迎合。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并不限于此。在将苏格兰纳入其戏剧化的不列颠共同体展演之后，莎士比亚的空间视点随之转向海外——继任英格兰王位后的爱德华昭告天下，“奉天承运，爱德华四世即位为英格兰与法兰西国王，爱尔兰大公等等”。^⑥ 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在宣读圣旨时以“等等”之语结束，这并非简单的话语省略，而是大有深意的

① 参见 John Speed, *The Counties of Britain: A Tudor Atlas by John Speed*, London: Pavilion Books Limited, 1995, pp. 25 – 264。

② 参见 John Speed, *The Counties of Britain: A Tudor Atlas by John Speed*, London: Pavilion Books Limited, 1995, pp. 265 – 268。

③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47 页。

④ 参见 A. J. Pollard, *The Wars of the Ros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98。

⑤ 参见 Geoffrey Bullough, ed., *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 Volume III: Earlier English History Play: Henry vi Richard iii Richard i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6 – 7。

⑥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73 页。

话术。《亨利六世》(下篇)显示,“爱德华从比利时带领着粗鲁的日尔曼和荷兰兵丁,已经安全地渡过海峡,向着伦敦急速进军”。^①由此可见,作为多国军队统帅的爱德华拥有诸多头衔,这是英格兰帝国疆域外延取向的隐喻。此外,莎士比亚还借牛津伯爵之口重提“当年约翰亲王曾经征服西班牙大部分土地”^②的光辉历史,并以华列克对爱德华王的“你不是阿特拉斯大力士,你背不起这个沉重的世界”^③的讽刺为反衬。这不仅表明爱德华王的不列颠帝国野心已可比肩罗马帝王,而且通过君王身份的类比将剧场观众引向对《国家政体》卷首图中推动宇宙运行的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帝国伟业的无限联想,由此勾勒出英格兰意欲重构“阿尔宾”进而征服世界的帝国共同体图景。

在华列克话语中提及的古希腊英雄阿特拉斯,以力举地球的伟岸形象屡屡出现在16世纪著名制图师墨卡托的卷首图中,以此隐喻地图的超然作用。阿特拉斯的英文名Atlas就是地图册的代名词。华列克虽试图在对阿特拉斯丰功伟绩的描述中将爱德华王丑化为行动的矮子,但这只是他的臆想;爱德华王已经将欧洲版图中的很大一部分纳入麾下。需要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将低地国家囊括在内的戏剧化英格兰帝国共同体想象有历史与制图意义上的双重原型:英格兰地理学家劳伦斯·诺埃尔(Laurence Nowell)不仅著有《英格兰和威尔士概况》一书,还曾在信函中描绘英格兰帝国共同体的蓝图。信中提及的迎合都铎国王意志的“我们的国土”(our region)范围远超英格兰和威尔士,“延伸到苏格兰低地和邻近的佛兰德、法国以及爱尔兰的沿海地区”。^④1579年,萨克斯顿的郡县地图集册“收集了34幅区域地图……并以一幅名为‘英吉利亚’的总地图开始,由此展示了存在分歧的‘文化综合体’,即英格兰和威尔士作为一个紧密交织的整体,苏格兰、法国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则在边缘徘徊”,^⑤其中的英格兰中心主

①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4页。

②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③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779页。

④ 参见 Nilanjana Mukherjee, *Spatial Imaginings in the Age of Colonial Cartographic Reason: Maps, Landscapes, Travelogues in Britain and Indi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40.

⑤ Nilanjana Mukherjee, *Spatial Imaginings in the Age of Colonial Cartographic Reason: Maps, Landscapes, Travelogues in Britain and Indi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41.

义色彩昭然若揭。此外，通过反复提及亚瑟王等古不列颠神话人物，^① 莎士比亚也极力为《亨利六世》基于文学地图想象的帝国共同体形塑寻找历史及神话源流。这样一来，“宗谱的残余结构为新获得的权力和特权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基础。都铎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则引用了布鲁图和亚瑟的传奇名字，编造的古老传说证实了一个新王朝对英国王位的要求”，^② 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建构由此融入了文艺复兴古为今用的文学艺术大潮，成为一道引人瞩目的空间景观。

四、结语

总体而言，亨利王的在“海盗”围困下的“英格兰之舟”与约克公爵、爱德华王围绕英格兰中心主义展开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地图想象之间，呈现了极强的戏剧张力。莎士比亚借此表达 16 世纪晚期西班牙入侵背景下英格兰帝国的空间生产困境及焦虑。同时，他在国土空间的隐喻及地图表征层面进行了舞台映射，从而在更为宏大的英格兰扩张语境中，将其帝国共同体建构野心展现出来。在英西海战后，欧洲新教与天主教之争越来越激烈、残酷，这种斗争蔓延、渗透至戏剧、制图、绘画等诸多领域。16 世纪 90 年代，与马洛在《巴黎大屠杀》中将伊丽莎白一世刻画为将法国从天主教及罗马教皇的桎梏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的书写策略如出一辙，^③ 莎士比亚也借玛格丽特之口对亨利王身上的“天主教”君王气质进行了讽刺：“我看最好由红衣主教最高会议选他去当教皇，把他送到罗马，把教皇的三角冕安在他的头上。”^④ 这就在亨利王与肩负地球（世界）的爱德华王（伊丽莎白女王的戏剧镜像）之间形成了极具反差性的互文语境，从而预先勾勒了伊丽莎白女王“棒打”罗马天主教皇的英格兰帝国图景。前文提及的名为《化身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一世》的欧洲地图，臆想了伊丽莎白女王力挫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欧洲天主教联盟的图景：“女王右臂由意大利充当，左臂则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构成，其双脚根植于波兰；在其左边，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挫败，右边则是由寥寥数船组成的舰队——喻指教皇联

① 参见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20 页。

② Jean E. Howard and Phyllis Rackin, *Engendering a Nation: A Feminist Account of Shakespeare's English Hi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46.

③ 参见 [英] 克里斯托弗·马洛：《马洛戏剧全集》下卷，华明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636 页。

④ [英]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 3 卷，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4 页。

盟——正护送着由神职人员充当划桨手的一条小艇上的‘三头教皇’（triple headed Pope）溃逃。”^① 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亨利王的王舟受困于海盗的图景联想可能引发的早期现代英格兰民族及国家身份形塑焦虑，同时呼应了当时英格兰的一系列航海活动，以及以德雷克和雷利爵士为首的英国国家海盗对以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联盟实施的所谓充满“正义”与“正当性”的掠夺行为。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借助海盗式制图标榜“正当”的英格兰帝国共同体形塑手法，归根到底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隐喻投射，其间充斥着掠夺、血腥与暴力。这一致力于文化掠夺的剧场版“德雷克”的“入侵行径为英国下一个世纪基于咄咄逼人的私掠行动的帝国扩张树立了标准”。^② 随着17世纪后期“帝国的新地理和海盗的规模对现有的法律分类制度提出了根本挑战，海盗再次成为尖锐问题”。^③ 此外，从身份形塑的文化遗产逻辑看，莎士比亚无疑为英国乃至欧洲后续的航海文学奠定了以掠夺和殖民为中心的范式，滋生了有悖空间正义的帝国殖民因子。他在《亨利六世》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海盗展演及制图实践，不仅为以18世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和《辛格顿船长》，19世纪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海盗》以及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为代表的航海小说构建了空间攫取模型，而且为英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建构的英联邦提供了先验性的雏形预演，掀开了英式海盗叙事新篇章。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Roy C. Strong, *Portraits of Queen Elizabeth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14.

② Mark G. Hanna, *Pirate Nests and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1570–174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p. 44.

③ Matthew Norton, *The Punishment of Pirates: Interpre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rder in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Empi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 37.